

弘扬 **伟大抗战精神**

青年学者 **深调研**

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制胜秘诀



□安娜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强大的组织力对于领导、动员、整合全党和全社会力量,实现党的政治纲领和价值目标至关重要。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严密组织体系、团结动员群众,不断提升组织的引领力、执行力、凝聚力和动员力,不但在孤悬敌后的困境中生存下来,而且在抗战烽火淬炼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汲取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启示意义。

树立组织目标 凸显引领力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华南抗战中,广东党组织采取领导进步团体、办刊办报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了大批党员、青年和革命群众,产生了强大的引领力。

抗战初期,广东党组织一度遭到破坏并停止活动,中国青年同盟、突进社等党的外围组织先行组建起来,他们或由中共党员组织,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或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为重建广东党组织创造了思想条件。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广东党组织举办各类培训班,加强了对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在香港举办晚间培训班,在广州举办走读培训班。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之初,开办两期训练班,时任省委书记

张文彬亲自讲授政治形势和党史。1939年至1941年,琼崖党组织先后创办随营军事政治干部培训班、琼崖抗日公学、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军政骨干。不仅如此,广东及各地党组织还坚持办刊办报,除依托抗日团体创办《救亡呼声》《新战线》《先锋队》外,还领导创办《抗战大学》《救亡日报》《新华南》等报刊,将合作与斗争、政治与文艺、经典理论与革命实践、国内视角与国际视野有机结合,为促成全民抗战局面营造了舆论环境。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将革命队伍的信念和行动统一于民族解放的崇高使命中,为广东党组织的重建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提供了思想保障。只有树立坚定信仰,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才能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推进伟大事业的实践力量。

落实中央指示 展现执行力

执行力是保证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的基础。华南抗战中,广东党组织虽然孤悬敌后,但是党中央在关键时刻均给予明确指导,广东则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中央指示转化为实际行动,推动了华南抗战的历史进程。

七事变后,中央提出要“扩大救亡运动”,广东党组织在数月内成立众多抗日救亡团体,唤醒了各界民众的爱国热情。广东党组织积极支持、帮助对日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组织动员800多名青年(其中党员200多名)参加十二集团军,开展政治工作,坚定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信心。1938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广东党组织根据决议精神,推动组织工作的大发展。日军入侵广东后,中央敏锐判断时局变化,明确“进行秘密工作”“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等任务,广东党组织遂将工作重点转向农村,领导成立抗日武装,逐步发展为东江、琼崖、珠江等7支纵队,总兵力超2.8万人,牵制日伪军15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大局,华南敌后战场也因此成为全国三大敌后战场之一。香港沦陷后,广东党组织立即行动,成功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等

800多位名人及家属,进一步密切了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患难与共的关系。

历史证明,广东党组织在落实中央指示中展现出的强大执行力,是华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政治原则,做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主动执行、结合地区实际的创造性执行,才能推动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实践效能。

克服重重困难 增强凝聚力

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严密的组织体系实现。华南抗战中,广东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数次沿革、曲折发展,但始终围绕“建立强大的党的组织”的任务,不断扩大党员队伍,建立严密组织体系,推动组织内部行动一致、相互配合,迸发出强大的凝聚力。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政权的镇压,广东党组织陷入“建立一破坏一建立”的循环,在香港工委遭破坏后基本停止活动。1936年9月,以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的成立为标志,广东省级领导机关重新建立。由于形势复杂多变,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广东党组织仍然经历了南临委、南委、广东省委、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省临委、广东区党委等数次更迭。1938年4月,广东省委成立,明确“广东工作应以建党为中心”,全省县级以上大多建立了党组织,部分县成立了直属党支部。1943年1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简称“省临委”)成立,不仅恢复了东江地区的组织工作,重新与南路特委、琼崖特委、潮梅党组织建立联系,而且推动了敌后游击战的全面发展和各纵队的思想政治建设。1945年7月,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简称“广东区党委”)成立,管辖东江、粤北、粤中、西江、广州、香港、闽西南、潮梅、南路的党组织,指导琼崖特委工作。至此,广东区党委和地方党组织在思想和行动上达到空前团结统一,迅速打开了华南抗战新局面。

历史证明,广东党组织形成上下贯通、力量倍增的严密组织体系,为领导华南敌后抗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

组织优势才能转化为改革发展动能。

密切联系群众 发挥动员力

党的组织动员力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力量之基。华南抗战中,广东党组织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促使各界民众自觉团结在党的抗战旗帜之下,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此,广东获得“统一战线模范省区”的赞誉。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广东党组织以青年为先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随着抗日团体尤其是青年团体的蓬勃发展,1938年1月1日,由共产党领导的全省性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成立。至1939年5月,全省抗先队员发展到1万多人,各地“青抗”组织发展到2万多人,还组织了规模达数千人的自卫团、农民抗敌同志会和妇女团。在广东党组织的带领下,抗先走出了一条青年知识分子与民众相结合投身革命的独特路径,为党的群众路线走向成熟积累了实践经验。

党的组织动员力大小还取决于能否满足群众需求。广东党组织在建设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政治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制定地方施政纲领,分区召开国事座谈会,加强与各界人士的合作;经济上,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推动军民合作生产,打破经济封锁;文化教育上,发展新闻出版业,开展文艺活动,做好教育普及工作。根据地成为团结抗战的坚强堡垒。

广东党组织同样重视华侨、港澳同胞的抗战动员工作。香港工委、南临委、南委均以香港为基地,动员华侨、港澳同胞支援抗战。华南抗战动员中,华侨、港澳同胞的参与深化了“群众”的概念,为抗战胜利凝聚起更深厚的伟力。

历史证明,广东党组织将一切爱国力量凝聚起来,为华南抗战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整合社会力量,凝聚社会共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与党一起奋斗。

作者简介:安娜,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处(文献编研处)副处长(作者头像绘制 蔡红)

秉持人民城市理念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徐伟明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于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这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快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提供了重要遵循和科学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新时代的原发性突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因此,要坚持人民城市理念,从规划引领、服务提质、治理驱动、空间再造四个维度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让城市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坚持以人为本 厚植城市规划人民底色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这就要求要以人民城市理念来引领城市规划工作,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不断完善城市空间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这表明,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城市规划的重点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以人为本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

一方面,城市规划要聚焦人民群众需求。城市规划作为城市更新的基础性工作,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把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城市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城市体检”聚焦现实问题,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上下功夫,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融入到城市的系统规划当中。

另一方面,城市规划需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规划过程中,应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强化公众参与,以提升规划的民主性与合理性。例如,广州为改进和完善城市规划方案,曾对全市11区39条行政街200个社区进行了深入调研,了解广大市民对城市规划与更新的意见和期待,为打造高质量城市空间提供重要参考。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度,可以让城市规划方案更贴合人民群众需求,从而有效破解城市更新中的痛点难点。

优化公共服务 提高城市生活宜居质量

公共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社会公平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提升城市宜居性的关键因素。当前,我国城市公共服务存在着配置不均衡、结构不完善、公共空间不足和资金匮乏等问题,因此要不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市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

一是要加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城市居民动态需求,精准把握城市居民满意度较低的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对存量空间的整合利用,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有效改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结构,提高城市居民的满意度。

二是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坚持以人为本,将公众参与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监督、调整等环节。同时,针对现存公共服务需求,通过制度创新,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改进供给方

式和方法,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例如,广州市越秀区作为全国首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通过创建“15分钟优质生活圈”样板,有效激活了现有资源,优化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提升了整体服务质量。

三是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提供有力保障。一方面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布局,以集约高效的配置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另一方面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建设,为城市更新发展提供更多元、更灵活的公共服务支持,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深化公众参与 激活城市治理内在动力

人民城市理念要求城市更新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石,通过保障公众有效参与提升工作效率。城市更新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共享发展”的核心原则,注重发挥社群机制效能,推动多元主体在互动协商中凝聚共识,最终实现城市更新目标。

一方面,需畅通公众参与渠道,推动城市治理全过程开放。城市治理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让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参与到城市治理过程;同时,充分运用市民服务热线等机制,高效回应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从而提升城市更新的公开性与公正性。

另一方面,要构建多元主体协商机制。城市更新不仅需要公众参与,更需要公众的有效参与,就是要确保公众意见能够真正进入到城市治理过程。将公众参与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可切实提升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性,让规划与实践更贴合城市长远发展需求。例如,广州市海珠区采取“街坊议事厅”民主协商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的平台”表达诉求,并将群众意见纳入到城市改造方案当中,从而有效提升城市更新质量。

注重文化赋能 增强城市空间品质内涵

城市品质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仅直接关联城市生活质量,更表现为城市人文环境,深刻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将城市人文传承与经济、社会效应深度融合,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经济活力间寻求平衡,不断丰富城市空间的品质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文化遗产的利用是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措施,也是推进城市更新的重要任务。要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以数字技术赋能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与人民美好生活精神需求深度融合;以“绣花功夫”活化城市文化资源,守护城市独特历史文脉,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城市模式。

例如,拥有14处历史文化街区、188处不可移动文物建筑、226处历史建筑、372处传统风貌建筑、60项各级非遗项目的广州市荔湾区,把岭南文化作为高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重要支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底蕴、文化内涵、文化价值。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活化利用为契机,全面修复旧城风貌肌理,打造高水平公共服务体系,发挥永庆坊、泮塘五约等“网红”项目示范作用,以点带面激活西关历史记忆,打造了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体验的高品质人文城市模式。

作者简介:徐伟明,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注: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2023年度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政治哲学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多维阐释与话语建构研究”(GD23XZZC13)的阶段性成果

湾区 **观察**

□吴育珊 张陈军

2025年7月1日施行的《广东省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统筹协调广东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意义重大。《条例》系统总结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设“绿色发展”专章,依托法治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嵌入海洋经济发展全过程,有力回应了二者协同共生的重大命题。此举既是广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也为全国沿海地区探索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向海图强”新路径提供了先行示范。

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 让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揭示出,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蓝图中,海洋经济是“向海图强”的动力,海洋生态则是永续发展的根基,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

健康的海洋生态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若超越生态承载力,海洋开发便如空中楼阁,难以持久。唯有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海洋经济的“蓝色引擎”才能持续迸发澎湃动力,实现长期繁荣稳定。与此同时,蓬勃发

展的海洋经济,又能为海洋生态保护提供坚实的物质与技术支撑。

厚植海洋资源禀赋优势 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广东省作为海洋大省,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and 海洋资源禀赋。2024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为20022.5亿元,总量连续30年位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广东将“全面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在打造海上新广东上取得新突破”列为省委“1310”具体部署的“十大新突破”之一,在打造“海上新广东”的征程中不断迈出坚实步伐,海上风电产业蓬勃发展,海洋渔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海洋经济的“蓝色引擎”动力愈发强劲。然而,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确保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是广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这一论断将海洋发展提升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海洋强国建设的“头雁”,更应率先探索海洋经济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筑牢法治保障根基

在海洋强省建设中,只有把绿色发

以法治为纲 广东推动海洋经济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

展理念从倡导转化成行为规范,广东才能走出一条“向海图强”与“向绿而生”同频共振的示范路径。由此,《条例》第四章“绿色发展”应运而生,以法治力量保障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一是刚性约束,划定“三线一率”生态红线。《条例》明确要求“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严格落实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为海洋开发活动设定了不可逾越的刚性约束和法律边界,要求科学推进各类涉海开发保护建设活动。

二是“分层用海”,推行分层设权,破解空间冲突。《条例》通过强化海洋生态空间和海洋开发利用空间管控,要求提高海岸线保护水平和利用效率,引导近海高效绿色利用,拓展深远海发展空间,规范无居民海岛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授权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范有序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探索海上风电、海洋养殖、海底管线等分层用海,促进海洋空间资源集约约高效利用。

三是系统修复,构建占修平衡多元投入机制。《条例》要求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整体保护,加强涉海自然保护地和各类生态廊道建设,推进红树林、珊瑚礁、海藻场、海草床、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重要渔业水域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类型的系统保护。同时聚焦“系统性保护修复”,提出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并要求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建立健全海岸线占用与修复平衡制度,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完善海岸线整治修复资金投入机制。